

南洋学会多元化、 本土化与年轻化的进程 ——代序

陈荣照
南洋学会会长

南洋学会创立于1940年，是东南亚华人最早研究南洋课题的学术团体。70年前的3月17日，几位在星洲日报编辑部服务的文化人，齐聚在余东璇街的南天酒楼开会，成立了“中国南洋学会”，他们是姚楠、张礼千、郁达夫、刘士木、关楚璞及许云樵。当时的基本会员只有19人，首届理事是上述6位加上在上海的李长傅。

中国南洋学会是“以研究与发扬南洋文化学术为宗旨”。1940年6月《南洋学报》创刊，由许云樵担任主编。此外，学会也不时出版《南洋学会丛书》和举办学术讨论会。学报刊登的文章，中英文兼顾，可见早期的学会理事，是有意要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但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因此，从事学术研究，也深受中国学风的影响。

许云樵在《南洋学报》第一期的《发刊旨趣》中说：“凡是关于南洋的一切学术，不论其为史地，为语文，为生物，为人种，为艺术，为民俗，为经济，为宗教，……都可以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不难发现早期学报的内容，重点不在东南亚华人史的研究，而是发表了不少有关史地考证、人种探讨、民俗搜奇、语文专论、生物研究，史料整理和校注的文章。



这种情况，要在二战后才有所改变。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1942-1945），南洋学会迁址到重庆，由住在中国的理事张礼千、姚楠与会员朱杰勤主持会务，《南洋学报》暂时停刊，但会员的研究工作并未中断。从1943年至1948年共出版了十种南洋学会丛书，在战时艰苦的条件下，能有这样的业绩，是由于得到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的支持。

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新加坡重归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南洋学会也在1947年重回新加坡活动。这时学会的基本会员除了来自中国的学者之外，也吸引西方学者的加入。如《南洋学报》第四卷第二辑（1947年12月版）刊载的论文“Prehistory in Malaya”（马来亚之史前研究）作者 M. W. F. Tweedie，是当时莱佛士博物院院长，兼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秘书。另一篇“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东南亚应有国际性之科学合作）的作者 R. E. Holttum，是当时的新加坡植物园园长，两位都是南洋学会的新基本会员。这一年共有7名英国和马来学者加入学会，而且也 and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有更频密的接触与交流。由此可见，南洋学会是在朝向多元化与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二战后世界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南亚各国争取独立的呼声动天，民族主义斗争加剧，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1959年6月5日，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新中国政府也鼓励各地华侨加入当地国籍，促使新马的华族移民，面对国家认同的抉择。

1958年8月23日南洋学会在中华书局召开会员大会，会上林我铃提议学会的中文名改称“南洋学会”，不再冠以“中国”二字，获得通过。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改变，显示学会要突破以西方或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以便赶上本土化的时代潮流。

这一年的新理事全部由本地人担任。《南洋学报》的主编也改选为曾留学英国并在马来亚大学（当时校址在新加坡）任教的王赓武，因而学报所选刊的论文，也转向以新马华人史的研究为重点；60年代后，作者群中还涌现了南洋大学的师生，本土化的进程进一步加速，这种研

究趋势一直延续迄今。70年来《南洋学报》共出版64卷，总计78期。先后担任主编的理事有许云樵、王赓武、郑子瑜、李庭辉、魏维贤、崔贵强、李励图、郭振羽、陈寿仁、杨进发、陈松沾、陈荣照与李志贤。在《南洋学会出版书刊总目(1940-2010)》中，详列各期学报篇目，读者可以从中看出学会研究方向的发展与成果。

除了学报，学会也于1971年出版《南洋季刊》英文版，到1985年停刊，共出15期，对促进学会与国际学者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学会还在1982年接编《东南亚教育学报》，共出版10期，颇受教育界的重视，《南洋学会出版书刊总目》也都编列了细目，方便读者查阅。

本会出版的另一重点项目是《南洋学会丛书》，加上纪念文集、个人文集、专刊等，迄今共有73部专著。内容涵盖面甚广，注重本地的文化脉络以及社会环境的探讨，包括中外文化交流，东南亚各国历史与地理、古迹的研究、人物传记、经济、报业、会馆、教育、民俗的专史，以及史料、碑铭汇编等，不一而足。这些著作作为我们了解当地华人的文史发展及其融入本土社会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无疑是当前的本土化问题研究的基础。本会特约南洋研究学者林孝胜在《南洋学会出版书刊总目》中为这套书撰写评介，从作者、内容与特色三方面着笔，钩玄提要，词约而赅，足资参阅。

新加坡《南洋学会丛书》的出版年代，是从1960年至2010年，这期间魏维贤担任会长长达30年(1970-2000)之久，对丛书的策划与出版，贡献至巨。此外，本会出版上述学报与书刊，大部分经费获得李氏基金及其他热心人士的赞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学会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举办学术演讲。这可分国际研讨会和小型座谈会两种。本会过去曾经与北京、广州、厦门、台北与香港等地的东南亚研究学术机构，联办过多次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参加，宣读论文，进行交流，会后出版论文集。较近的会议如1986年本会与中国历史学会、国史馆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台北联合举办“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2003年本会与北京大学东南亚文化研究所在新加坡联合举办“东南亚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研讨会”等。



2010年12月，本会为纪念创会70周年，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办“南洋研究的回顾、现状与展望研讨会”，旨在总结70年来南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展望面向新世纪的研究前景。来自中、港、台、日、澳大利亚、大马各地的学者，在会上宣读了构思缜密、见解独到的精彩论文。他们大都是本会的老朋友或会员，有的是《南洋学报》或《南洋学会丛书》的作者，一路走来都在积极支持着学会的发展，我们确是感激不尽！

研讨会的筹委会成员，大都是本会年轻的理事，他们都有各自的职业，几个月来都是充分利用业余的时间，同心协力地筹划，干劲十足，才能使大会成功举行。

除了大型研讨会，本会请专家学者作专题讲座更不计其数，这些学术活动，在常年的会务报告中，都有详细的记录，不赘。

学会第一代的创会理事，都已先后作古。早期的会员也逐渐老化，虽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资深的会友仍可以丰富的学识与宝贵的经验继续辅导学会的运作，但学会和其他社团一样，如要积极推动会务，要跟上时代进步的潮流，必须接受自我更新的挑战，不断吸收年轻的新会员，理事更要年轻化。

2002年我接棒出任学会会长，当时理事的平均年龄是73.7岁，年高德劭的刘蕙霞副会长就提出应多鼓励年轻的学人，加入本会，大家都有这个共识。近几年来，学会就朝年轻化的方向循序渐进，逐渐让年长的理事退居幕后，或担任顾问，职位由新血替换。到39届（2006年）理事的平均年龄是65.9岁，40届理事是55.7岁，本届（41届）理事是49.6岁。我们期盼本会老中青全体会员，继续支持与参与本会举办的各项学术活动，也希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以匡不逮，使学会更为壮大，为南洋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2010年11月3日初稿，原刊《南洋学会出版书刊总目(1940-2010)》
2012年6月28日稍作补充